

建國以來若干史學問題研究述評



山東史學集刊（總第八期）

專號之三

目 录

建国以来东夷古国史研究讨论述要·····	逢振镛 (1)
关于秦汉史的学习与研究·····	安作璋 (33)
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孙祚民 (49)
建国三十五年来中国宋元史的研究概况 ·····	赵继颜 (92)
建国以来中国甲午战争研究述评·····	戚其章 (102)
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述评·····	路 遥 (151)
建国三十五年来山东近代史研究述评 ·····	段国庆 庄维民 (184)
世界古代史研究三十五年简顾与若干问题之我见 ·····	王阁森 (200)
世界中世纪史学科的回顾和发展趋向·····	刘明翰 (226)
三十五年来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简况·····	张培义 (269)
建国以来美国史研究概况·····	刘祚昌 (276)
建国三十五年来亚非拉史教学和研究概况综述 ·····	王春良 (299)

建国以来东夷古国史研究讨论述要

逢振镛

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三十五年来，山东东夷文化和东部古国史的研究（简称“东夷古国史”），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史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的积极努力，已经初步开展起来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进一步开展山东东夷古国史的研究，现将建国以来东夷古国史的研究和讨论的情况，摘要综述如下。

一、研究概况和主要成绩

山东（主要是东部）是东夷族聚居之地，以后建立了许多小国。从现有资料的种种迹象看，东夷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它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曾有过璀璨夺目的黄金时代。它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但是，自西周以来，由于受“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的思想的影响，总认为只有中原才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其他地区，如夷人居住的东部地区，总是落后的，他们总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当时的文献资料对夷人历史文化的记载甚少，而且还夹杂着许多贬抑的内容。这就给后来的研究者进行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而，光辉灿烂的东夷文化和东部古国史被贬抑被埋没了长达几千年。到了近代，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除继

续受中原文明起源说的影响外，又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而带来了一个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在这两种谬说的影响下，致使东夷文化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它的光芒未能放射出来。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山东城子崖、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动摇了文化“西来说”，而且也动摇了中原文化“唯一”起源说。它证明山东的文化并不低于中原。而山东这个地区正是东夷人的居住地区。东夷文化和东部古国的研究，应该说，最早是从这里为起点的。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连年战争的影响，对东夷古国历史的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全国解放后，东夷古国史的研究开始了新生。被埋没三千多年的东夷古国史的灿烂光辉又开始重放光芒。三十五年来，取得的主要成绩有：

1、考古资料逐渐增多，东夷文化序列大体确立。建国以后，考古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山东境内，先后发现龙山文化遗址二百多处。1959年在山东泰安发现了大汶口遗址，以及早于龙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的确立，是建国以来考古发掘的最重要成果。此后，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亦不下二百余处。与此同时，早于大汶口——龙山文化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也在我省发现多处。如临沂地区的沂源、泰安地区的新泰、烟台地区的长岛、蓬莱等地。这其中，最重要的是1981年在沂源县洞穴遗址里发现了直立人的头盖骨和原始的打制石器，时代属中更新世，与北京猿人相当，同属旧石器早期遗存，充分证明五、六十万年以前，山东地区已有远古人类居住。建国三十五年的考古工作，使山东地区旧石器时

代开始的沂源猿人，到新石器时代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后来的岳石文化等这样几个文化发展的序列，已经大体确立。此外，在山东东部地区，商、周时期的铜器和其他文物发现的也很多，这为东夷古国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研究工作的初步展开。山东考古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东夷古国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建国三十五年来，东夷古国史的研究工作，大体说来，可分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建国开始到1981年为止，在这段时间里，东夷古国史的研究工作，主要表现在个别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的研究上。这三十二年中的头十年，主要是对东夷古国史开始注意和个别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等）、考古学家（如王献唐等）根据建国初期出土的文物资料作了一些零星的研究，后二十二年的时间，才开始有人对东夷古国史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如李白凤对东夷族的研究，王献唐对东部古国（包括整个山东古国在内）的研究，等等。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研究还是非常肤浅的，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改变了过去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而采取了文献记载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2年开始至今，共三年的时间。在这三年中，东夷古国史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山东省历史学会的主持下，汇集全省部分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进行有领导有组织的研究。这个工作得到了省内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使东夷古国史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三年中，省历史学会共召开了两次东夷古国史学术讨论会。第一次是1982年春在淄博市召开，到会代表二十余人，会议就东夷文化和齐、

莱、鬲、莒等古国史诸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讨论，大家提高了对东夷古国史研究必要性的认识，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这次会议对东夷古国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建国三十二年来第一次举行这样的会。第二次是1983年夏，在黄县、长岛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三十余人。这次会议着重就莱夷、莱夷文化和莱、鬲、纪、齐、莒等东部古国史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收到论文十多篇。会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这个阶段，东夷古国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历史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探讨，使东夷古国史的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

3、东夷古国史资料、论著的出版。建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的有关东夷古国史的考古发掘、调查资料140篇以上，各种文章百篇以上，合计250篇以上。出版的资料专集有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和济南市博物馆合编的大型发掘报告《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出版），讨论专集，有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编的《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出版）。研究专著有：李白凤著的《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出版）；王献唐著的《黄县鬲器》（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和《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

二、研究讨论的主要问题述要

东夷古国史是建国以来新兴的研究领域。建国三十五年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不多，而在学术界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就更少了。但是，对东夷古国史上的许多问题，无论是史学界或是考古学界，又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为了让大家对建国以来东夷古国史研究和讨论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促进今后东夷古国史研究讨论的开展，现将建国以来研究讨论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以及部分观点的主要根据，摘要叙述如下：

（一）关于东夷和东夷文化

这个问题，学术界主要围绕着东夷包括哪些氏族部落，东夷的文化水平以及东夷文化的历史地位等三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

1、东夷包括哪些氏族部落？

由于文献记载奇缺，又自春秋出现“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说之后，几千年来，一直把东夷族看成是黄帝族的一支。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看法很不一致。今人的看法，主要有：少皞夷族杂居说、山东本地许多不同部落说、东夷包括淮夷岛夷说等等，这些不同说法的争论情况是：

范文澜说，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被称为“狄族”，“戎族”，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称为蛮族。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因而把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身上。黄帝的后裔，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少皞族可能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接受了太皞族的文化，因此称为少皞，成为夷族文化的继承者。^[1]

李白凤一方面批判了“万世一系”的旧说，另一方面对范老的说法提出了批评。他说，把黄帝族以后的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发祥地完全不同的氏族都强隶属于黄帝名下，统归之于“炎黄遗裔”这种万世一系的思想之产生，应该是产

生在春秋以后的事。至于把苗族和东夷、徐夷都硬拉到黄帝的名下，更是谎诞无稽的事。经过初步探索，黄帝、太昊、少昊这些古代的氏族是实际有过的，但并不是人名而是族姓，除了黄帝聚居在今郑州一带之外，其余各族都聚居在山东省南部。黄帝族的遗裔受到远自山西安邑来的夏族的压迫，东迁到山东曲阜一带，和太昊族、少昊族是一脉相传的。但是，这个氏族和原来居住在东方的东夷、莱夷、徐夷绝对不可能有着血缘关系。因之，把许多分明无关的古代氏族都编到黄帝的名下的旧说是一种很不实际也不合乎科学的说法。至于范老的说法，李白凤说，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旧说，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对各族居住情况及其演化没有加以说明，并且在最后仍因袭旧说，认为“黄帝是华族的始族”。实际上是承认了“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的陈旧说法。我认为，黄河流域的下游，原来居住着一些散居的氏族，他们被来自西方的姜族打退到东方去，这些退居到山东一带的氏族本来是许多不同的部落，象莱夷的鬻族、东夷的鱼族和鼯族、徐夷的虎族皆是。^[2]

郭沫若说：从黄河下游到江淮流域是东夷和淮夷活动的地方，共有九部，合称九夷。传说太皞是风姓，应同九夷中的风夷有更直接的关系，风夷在夷人氏族部落中居于首要地位，因而太皞又是所有夷人想象中的祖先。少皞的后裔主要活动在山东半岛上。^[3]在《卜辞通纂》中郭老又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在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4]

李白凤不同意郭老的意见，他说：“东夷应该不包括淮

夷，因为古籍与金文凡称淮夷大概都称东南夷或东淮夷”。^[5]

王汝涛则认为，岛夷地望不在今山东，应是“指居住于今河北及苏北沿海之夷人，与山东无涉。倘若正名，则本文所言之山东夷族，称岛夷或九夷均易造成地望上的混乱，转不如直称‘东夷’较为直接清楚”。^[6]

2、东夷族的文化水平。

东夷族的生产发展状况和文化水平怎样？吴汝祚和杜在忠二人分别就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论述：

吴汝祚根据考古发掘的大量的实物资料，对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族生产发展状况和文化水平作了论述。第一，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族已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处在锄耕农业的阶段。并发现了鹿角锄、鹿角鹤嘴锄等播种、中耕除草的农具。中耕有抗旱保墒作用，是农业技术的一大进步，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业也有迅速发展。第二，手工业也相当发展。当时玉器制作技术很高，象牙器制作技术也很先进，镶嵌技术已处在萌芽阶段。制陶业在当时的原始文化中，实居领先地位。当时已有了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距今约四千五百年，是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象形文字的发现标志着人类社会已发展到接近文明的门槛了。第三，作者还根据象形文字的发现，提出了大汶口文化中心东移的趋向。他说：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区是鲁中南泰山周围一带。后期，泰山以东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遗址象形文字的发现，说明大汶口文化的中心有向东移的趋向。这个趋向，恰为其后龙山文化时期东夷族的中心地区在山东半岛奠定了基础。^[7]

杜在忠在《莱国与莱夷古文化探略》一文中，着重就龙山

文化时期莱夷先进古老文化作了论述。^[8]第一，莱夷是东夷诸族中较早从事农业为主，并较早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的一个支族，其中心区域在胶莱平原。第二，龙山文化时代，手工业制陶技术水平较中原同期文化，显然占领先地位，特别是其质硬、胎薄、火候高为其他同时文化所望尘莫及。不少鬲、盂、甗、甬、高柄杯及各种造型的耳杯等，其形制之优美堪称我国甚至世界上远古制陶工艺的精华。在技术上普遍采用快轮技术，使手工业制陶在质和量上发生了一次飞跃。总之，胶莱平原上龙山文化在制陶技术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多样性几方面都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器时代早期的最高水平。第三、在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方面，也表现了较突出的先进性。这时，铜质小件器物已出现，尽管不多见，但已示预示着在生产力方面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变革即将到来。

3、东夷文化的历史地位。

这个问题，自齐统一山东东部以后，一直被埋没、被遗忘、被歧视了几千年。东夷文化“落后”于中原的“东夷文化落后论”已成传统观念。建国以来，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东夷族的大量的陶器、铜器、文字等璀璨夺目的文物，一批接着一批的从地下出土，使传统的“东夷文化落后论”逐渐在动摇，在打破。人们对东夷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下面摘抄的，是最近几年的具有代表性的几种看法。

李白凤说：我认为东方各民族不仅在组成汉民族在“人种学”方面来说是居于主要的成份，同时在我国古老文化方面也是居于主导地位。莱夷族是东夷族的一支。在莱夷族中有一支

居住在山东半岛登州海角一带，就是翼族。翼族在青铜器文化成就方面，给后世的影响很深远。首先，“亚形图象”之器多源于此一部族，就其地域而言，凡具有此“亚形图象”之青铜器，多半出自山东东北部一带，其最远的极限止于益都；这一部族与整个东夷在文字书法上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直接影响西周铜器铭文的所谓“侧锋旁出，顿笔加肥”的特殊风格，这种刻铸艺术的精湛详细和安阳出土的商器文字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它有着高度的装饰趣味，西周成器虽然形似精湛，却不如。其次，它和东南方徐夷之器文字崇尚纤巧也有风格上的不同。总之，东夷是有着较高的青铜器文化的。^[9]

杜在忠指出，莱夷古文化有自己的发展序列，虽然在西周以后逐渐接受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但在此以前，它对中原以及周围同时古文化的影响还是不能忽视的。就制陶工艺来说，胶莱平原龙山文化的制陶技术自东而西直至中原的影响是显著的。与胶莱平原龙山文化两城类型同时者，有鲁西城子崖类型，豫北后岗二期文化，都承袭了许多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向后延伸，直至商周时期，仍然可看到莱夷先民的物质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再是被公认的我国最古老的文字，诸城前寨和莒县陵阳河两遗址出土的陶文，要比商代甲骨文早一千多年。因此，东夷是我国东部有自己灿烂文化的庞大部族，其中，莱夷对创造我国古老文化有卓越贡献，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源泉。^[10]

李步青、刘玉明则根据1981年莱阳前河前村出土的一件有铭陶盂，对东夷族的文化地位提出了一个新看法。他们认为，盂腹有图形文字二：“𠂇𠂇𠂇”；三虫大而突出，应是族

徽或图腾，从右向左读作“𠂔（己）𠂔（虹）”。此字也可合读作“𠂔𠂔𠂔”或“𠂔𠂔𠂔”，即“齐”字。此𠂔铭之“己𠂔”，应是山东东部沿海古代一强大部族的族徽或图腾。这个部族就是文献记载的山东东部商代的“𠂔（己）国”，西周沿称“己侯”。己氏族也就是史籍中的莱夷。莱夷有极高的智慧和创造力。莱夷起源于胶东半岛，以后逐渐向西发展至今昌潍地区，向北发展到辽东半岛。其山东部分大致相当于齐国最强大大时的范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并与南、北、西各相邻部族有文化交流。从𠂔𠂔铭文看，己族文字产生很早。对卜辞文字可能是有过影响的。己族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原和辽东，甚至可以远渡重洋，播及东北亚和整个太平洋诸岛及沿岸地区。^[11]

宋承钧、史明在《胶东史前文化与莱夷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根据胶东地区考古新资料，着重对胶东史前文化即莱夷文化的历史贡献作了进一步的论述。^[12]第一，胶东史前文化有自己的源头和发展序列，自成体系，独具特点，胶东半岛有一个新的考古系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创造者就是东夷的一个支族——胶东的土著莱夷。是他们创造了灿烂的胶东莱夷文化体系。第二，从胶东各地出土的文物看，早在一二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胶东地区就有了原始人类的活动。以后，他们逐渐向外发展。至新石器时代，向西，他们与鲁中南、鲁西地区联系越来越密切，于是形成了较大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体系，对中原夏文化有着巨大影响，向北，渡过渤海湾给辽东半岛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第三，在龙山文化时代，莱夷居民就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以及造船航海业。手工业的发展，

表现最为突出。胶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多种多样、璀璨夺目的众多陶器，足可以看出莱夷文化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特别是那薄如纸，黑亮如漆、头重脚轻的蛋壳陶，没有高超的工艺、专门的技术和物理、化学等多种综合的科学知识是造不出来的。陶器制作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从大汶口文化早期，直到岳石文化即夏朝时期，都很明显。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盛行的觚形杯，在胶东有最原始的祖形。夏朝的主要礼器，也都产生于东部沿海莱夷文化。可见莱夷文化对大汶口文化以至夏文化的巨大影响。金属冶炼技术，不仅已经领先出现，而且已达到较高水平。各地小铜器出现已不足为奇，最值得注意的是长岛店子龙山遗址灰坑中发现的一枚圆形铜片，经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化验鉴定是黄铜。黄铜较红铜、青铜技术难度更大，出现较晚。而早期的铜器，主要发现在胶东地区。这比欧洲最早出现黄铜（罗马帝国钱币）要早二、三千年。这在冶金史上不能不是值得重视的重大发明和贡献。再是造船航海技术，长岛大浩发现龙山时代的船尾，从结构看榫口非常整齐，残船桨和近代的无多大区别。长岛不仅有船尾发现，而且在海底还发现了原始的石锚，证明莱夷航海业的发达。第四，还有文字也值得注意。胶东地区发现了原始文字，如长岛大钦岛西周石板墓中发现的舟底铭文，乳山南新山石板墓发现的陶鬲铭文，以及莱阳前河前村发现的陶盂铭文等，与卜辞不同，且有的为卜辞不见。这样看来，莱夷在夷夏融合之前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总之，胶东土著莱夷，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在史前的一个较长时间里，其文化占全国领先地位，对周围地区，特别是夏文化发生了巨大积极影响。胶东莱夷文化是源，不是流，是中华民族

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关于东夷莱夷文化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它对周围（包括海外）的影响，我们的视野似应再开阔远大一点。在这方面，裴文中的《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载《科学通报》1978年第12期）和戴国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古地理证据》（载《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两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裴先生根据华北与日本之间陆生脊椎动物化石的许多共同特征和旧石器时代文化在发展顺序、石器类型和加工技术等方面的共同性、一致性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证据，证明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开始于十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旧石器晚期则更加频繁。戴国华则通过冰期气候、中日现生种、化石种动植物的密切关系、海底陆生脊椎动物化石的发现、海底地貌、海底沉积物的柱状样分析等几个方面考察更新世晚期东亚地区的海陆变化，证明更新世晚期，现在把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隔开的诸海域（包括海峡）都不存在，它们不过是一片草木茂盛、动物出没的陆地。那时，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相互连接，成为亚洲大陆的一部分。这样，就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中日之间迁徙、中日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地理上的可能。

最近，高广仁、邵望平对“东夷文化区”、“齐鲁文化区”的提法提出了新看法。^[12]他们认为：海、岱、淮所圈定的青、徐二州正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中心分布区，亦是后来商王朝本土以东的东夷诸国的活动地区和更晚的“齐鲁国境”。它是自公元前四千年间逐渐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区。称其为“海岱历史文化区”较之“东夷文

化区”、“齐鲁文化区”更觉恰当些。对海岱历史文化区的地位，他们认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到典型龙山文化时期，社会经济突飞猛进，跃居中华各史前文化区之前列，在制石、制玉、制骨及建筑技术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制陶业达到了制陶史上的顶峰。海岱地区私有制的产生、父权制的确立、阶级的出现也不晚于公元前三千年。而原始文字、金属工具以及城堡等文明诸要素在海岱地区出现也不比中原地区为晚。如果把海岱地区的某些文化成就比作文化“基因”，那么，我们从二里头、郑州、殷墟的夏商文明遗存看到了它的遗传后果。他们之间的源流关系是不难识别的。海岱地区无愧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关于东部古国

山东东部古国很多。建国以来，主要对齐、莱、箕、纪、莒等国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讨论。研究讨论的情况如下。

1、关于齐国。

齐国主要有两个问题看法不一。

其一是，齐国为什么称齐？

旧说有临淄附近天齐说、地近济（齐）水说等。今说主要有：沿用殷时旧国名齐说、小麦吐穗上平（齐）说、“天主”之神天齐渊说以及齐来源于“𠂔”“己”说等。下面就是这几种说法的讨论情况。

郭沫若的看法是：“齐当即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灭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春秋时齐地颇广大，殷代之‘齐’当指齐之首都营丘附近，今山东临淄县也。”^[14]

朱活的想法不同。他说，齐字甲骨文写作“𠂔𠂔𠂔”，作

“𥝌𥝌𥝌”，《说文》：“齐，禾麦吐穗上平也。”说明这与从事农业有关。事实上在今临淄一带还是山东小麦的高产地区。在太公封营丘以前，那里原为从事种植的齐族建立的北齐国。齐族的族徽应为小麦吐穗的形状，即“𥝌”字，他们与莱族牟族是有血缘关系的，否则太公初就国，莱侯为什么与之争营丘呢？其实莱与牟也是以种植麦类记入史册的。莱字甲骨文写作“𥝌”，本为麦类植物的象形字，而牟族似乎也是以种植大麦而记入史册的。总之，莱族、牟族和齐族都是种植麦类著称的。太公至营丘的施政方针是“因其俗，简其礼”，而国号仍旧称曰“齐”，这是很自然。^[15]

王恩田不同意朱活关于齐得名于小麦吐穗上平（齐）与种植小麦有关的说法。他认为：《说文》“齐，禾麦吐穗，上平也”一语系解齐字，并非解释齐国得名来历。“禾麦吐穗”亦不专指小麦，麦之外尚有禾。仅据《说文》对齐字解释，不能得出齐国得名与种植小麦有关的结论。王恩田仍然同意齐得名于天齐渊的古说，但根据不同。他说：齐国自古以来就有祭祀“八神”的传统。八神之首就是被称为“天主”之神的天齐渊。天齐渊位在临淄城南十里的牛山脚下，因其泉水涌出象天之腹脐（齐）而得名天齐渊。齐国即因源远流长的祭祀“天主”之神的天齐渊而得名。^[16]

李步青、刘玉明等人既不同意天齐渊说，也不同意临近济水说。对于朱活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也经不起推敲。因为齐字在卜辞中多见，书写很不一致：“𥝌”、“𥝌”、“𥝌”、“𥝌”等，明明上边不平，有的还倒书，头向下，怎能说是麦穗上平呢？那么“齐”名究竟来源于什么？，他们认为，

“齐”来源于“𡿨”，得名于“己”，齐、己是一国之称。“𡿨”在卜辞中有两个并书作“𡿨𡿨”，有三个并书作“𡿨𡿨𡿨”。这三种写法作为地名都是东方国家，都应读作“己”。这是因为在山东东部广大地域里，种族繁衍甚多，按地区特点分化成“𡿨”、“𡿨𡿨”、“𡿨𡿨𡿨”三种写法，以志区别。但读音还都应是“己”。齐国之所以叫齐不叫己，错误就出在周人读音与山东地方不同，灭殷之后，周人将“己”读为“齐”了。^[17]

其二是，古营丘在何地？

关于古营丘位置，史存两说，一说认为营丘即临淄，另一说认为营丘在昌乐的营陵故城。对这两说，今人仍有赞成者。

范文澜主张昌乐说。他说：东方奄和蒲姑两个大国，曾助武庚叛周。成王把奄国封给周公长子伯禽做鲁侯（都曲阜），又封外祖父太公吕尚做齐侯。吕尚都营丘（山东昌乐），灭蒲姑国。齐鲁两大国代替奄和蒲姑，商不能反叛了。^[18]

郭沫若则主张临淄说。他说：成王把师尚父封为齐侯，统治薄姑氏的土地和人民，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周公东征薄姑等国的事迹，见于墜方鼎铭文。师尚父即吕尚，姜姓，就是著名的太公望。齐国附近有不少东夷小国，先后被齐国并灭，因而齐国成了周朝的东方大国。^[19]

王恩田也同意营丘在临淄，但具体又在临淄何处？他认为：今临淄大城东北角“韩信岭”一带，具有地势高、遗物丰、时代早的特点。1971年秋在韩信岭西南边缘阙家寨的发掘中出土的陶鬲，与陕西长安普渡村墓葬出土的陶鬲形制相